

在救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濟各冊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聖人。普世教會，尤其是聖母軍，都認為這是一件喜樂的大事。現在，我想來談談聖若望二十三世和他對聖母軍的重要性。

聖若望二十三世就是召開第二屆梵諦岡大公會議的教宗。這會議是天主賜給教會的美好禮物。那時候，救恩史和世界史正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許多國家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遇上巨大的變局，人民的心靈受到重大的創傷。共產主義、納粹主義和各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影響了全世界。而且，兩次的世界大戰，還有在亞洲和非洲各地為爭取民族獨立的血戰，都帶來嚴重的破壞。在愛爾蘭，聖母軍誕生的地方，也經歷了這樣的戰爭。無神論的人文主義透過各式各樣的哲學理論毒害了人的思想。歐洲十八世紀思想上的啟蒙運動所強調的理性和個人主義，還有法國大革命的後果，影響還在。此外，還有許多因素導致世界道德敗壞。於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人們失去了判斷對錯的能力，失去行為準則，並為此受到很大的苦。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要怎樣去傳福音，就成為一個不可迴避的基本問題。

聖若望二十三世的回答就是召開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宗方濟各在講道時說：「聖若望二十三世在召開大公會議這件事上，表現了對聖神的絕對服從。他身為教宗的牧靈、服務和領導工作，完全服從聖神的引導。這是他對教會的偉大服務。因此，我願意稱他為服從聖神的教宗。」當然，服從聖神也是聖母軍團員的基本承諾，他們向人靈傳福音時，常應注意聖神的引導。無可置疑，大公會議主要是聖神的工作，它並不純粹是人的計畫。那麼，聖母軍與這個劃時代的會議到底有甚麼關係呢？首先要指出的是：教宗邀請聖母軍的創辦人方濟·杜福以平信徒聽眾的身份參加大公會的最後一次開會。這顯然表示教宗肯定聖母軍在教會傳教工作中的角色。我們最好記住蘇能樞機(Cardinal Suenens)那常被引用的話：「那時，擔任威斯敏斯特大主教(Archbishop of Westminster)的希南樞機(Cardinal Heenan)是會議的主席。他看到方濟·杜福進入會場，立刻向全體會眾公開宣布這事。在場的兩千五百位主教都站起來熱烈歡迎他。這感動人心的歡迎令人難忘：這一刻，普世教會對推動平信徒使徒工作的先驅表示感謝。」這也是教會明確肯定聖母軍的神恩。除此以外，大公會議的文件和聖母軍手冊裡的不少段落以及方濟·杜福的文稿顯然是一致的。我特別提出這些事實，因為有些團員曾經問我：有些神職人員認為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使聖母軍過時了；遇到他們時該怎樣回應？我認為他們的意見錯的離譜。

然而，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不只明白肯定聖母軍的工作，也同時加給聖母軍重大的挑戰。聖母軍在推行大公會議的教導和願景方面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或在鄉下，我們教區內的許多兄弟姐妹沒有機會享用大公會議的寶庫和偉大成果，例如「普世教理」和大公會後宗座訓導當局發佈的道理。我們怎能站著觀看，而不做點事呢？聖母軍蒙召去成為平信徒從事使徒工作的典範，推動實現「人人都能成聖、人人都能做使徒」的目標，使平凡的人成為「新福傳」的主要力量。天主舉揚方濟·杜福，使

他成為推動平信徒在教會內從事傳教工作的先驅。我們重讀他在梅努斯(Maynooth)那值得紀念的演說，會覺得深受鼓舞。演說的題目是：我們的潛在團員是仍未獻身神職的天主教徒。這一篇演說和他其他的演說回應了大公會議對聖母軍的呼喚。

我們剛剛透過回憶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短地談到聖若望二十三世對聖母軍的影響。但是，他和聖母軍有更直接的個人接觸。這些活動告訴我們他對聖母軍和聖母軍的神恩有怎樣的看法。例如，當他任駐法國的教廷大使時，他曾對威克洛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icklow)埃莉諾·巴特勒(Eleanor Butler)說：「法國的教會階層對聖母軍的看法是分歧的。我個人則沒有分歧，我全心支持聖母軍。聖母軍用的方法是對的。他們找尋有信德和愛德並願意去面對問題核心的教友。教會當局如果拒絕使用聖母軍，就是不顧他們所照顧的人靈的利益。」他以教宗的身份對一群法國聖母軍團員說：「聖母軍表現出天主教會的真實面貌。」他這句話似乎包含了聖母軍手冊內「聖母軍一定要推廣天主教的一切」的章節。手冊內也引用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另一句簡潔的話：「聖母軍有最卓越的制度。」他和聖母軍還有其他的接觸，包括他曾私下接見方濟·杜福弟兄和兩個大公會議的人員。

我希望我已充份說明聖母軍因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封聖而喜悅。他給了聖母軍極大的鼓勵，也給了我們重大的挑戰。聖若望二十三世，請為我們轉求天主，使我們完成祂召喚我們去做的傳教工作。